

# 多方言地区语言生活研究

## ——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

陈苗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9日

### 摘要

本研究以浙江省湖州市的多方言乡镇为调查点, 聚焦多方言地区居民群体的语言生活。通过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 研究发现在语言能力方面, 以河南话为母方言的居民普遍保持较高的母语熟练度; 在心理语言层面, 河南话仍是多数居民内心思维的主导语言, 普通话作为心理语言的比例随年龄降低而上升; 语言使用域方面, 普通话在正式场合中占据主导地位, 而河南话则在非正式场合中保持优势。最后, 通过统计检验, 发现当地受访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与普通话程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线性趋势。

### 关键词

语言生活, 多方言地区, 卡方检验, 方言保护

# A Study of Language Life in a Multi-Dialectal Region

## —A Case Study of Huzhou, Zhejiang Province

Miaojia Chen

Facul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May 11, 2026; accepted: June 17, 2026; published: June 29, 2026

###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several multi-dialectal townships in Huzhou, Zhejiang Province as survey sites and focuses on the language life of residents in a multi-dialectal region.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data analysis, the findings reveal the following: In terms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residents whose mother dialect is Henan dialect generally maintain a high level of proficiency in it. At the level

of inner language, Henan dialect remains the dominant language of thought for the majority of residents,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ose using Putonghua as their inner language increases with decreasing age. Regarding domains of language use, Putonghua dominates in formal settings, whereas Henan dialect retains an advantage in informal settings. Finally, a statistical test reveal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linear trend betwee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Putonghua proficiency among the local surveyed residents.

## Keywords

Language Life, Multi-Dialectal Region, Chi-Square Test, Dialect Prote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浙江省湖州市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区域，位于苏、浙、皖、沪三省一市的交界地带。历史上，该地区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迁移，形成了以本地土著居民为主体，同时融合了近百年来来自河南、湖北及浙江温州等地区移民的多层次人口结构。这些移民多为躲避战乱或进行山地垦荒而迁入，并多以聚族而居的形式定居于丘陵地带。由此，湖州地区的语言生态呈现出显著的移民性与多样性特征。当前，该地区并存平阳话(属浙南闽语)、河南话(属中原官话)、湖州话(属吴语太湖片)、湖北话(属西南官话)等多种方言。其中，外来方言在保持其源方言基本特征的同时，也在多种方言长期接触的背景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湖州土著居民所使用的湖州话属于吴语太湖片，具有典型的吴语特征。而作为区域强势方言之一的平阳话，主要源于温州平阳地区的移民迁移，具有鲜明的浙南闽语特点。此外，河南话与湖北话分别属于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也在当地语言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此多方言共存且差异显著的局面，其形成与发展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深刻影响。同时，多方言的频繁接触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区居民的语言能力及其方言使用域。

基于上述方言分布特征，本研究选取湖州市长兴县作为主要调查点，该地为典型的多方言地区，方言共存现象突出，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语言生活值得关注。

## 2. 研究现状与调查设计

本研究的核心概念“语言生活”在国内社会语言学界的讨论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早期研究较为零散，多关注语言规范问题，并未形成明确定义。2006年首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sup>1</sup>发布后才成为有明确指涉的独立研究领域。从研究演进来看，张利红和刘小艺(2023) [1]利用 CiteSpace 对 1998~2022 年间的文献做了可视化分析，发现语言生活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98~2004 年的发展期，主要关注语言文字本体规范；2005~2017 年的成熟期，研究主题扩展到语言政策、语言资源、语言服务、语言认同等；2018 年至今的拓展期，研究主题聚焦于乡村振兴、语言安全、应急语言服务等方面。这一分期对于理解整个领域的知识积累非常有帮助，这些研究趋势表明当下的区域语言生活研究要有意识地置于文化、社会层面的语言议题背景中。

纵观现有研究，多数研究或聚焦于某类特定人群(如农民工、老年人、移民)，或着眼于宏观的语言政策，这一框架对于浙江省多方言地区的研究尤其有参考价值。其次，在语言生活研究的理论体系中，“语

<sup>1</sup>[http://www.moe.gov.cn/srcsite/A19/s7067/200605/t20060522\\_76008.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9/s7067/200605/t20060522_76008.html)

言资源观”被公认为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苏新春(2025) [2]对此做了系统梳理,其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或文化载体,更是一种与矿产资源、水资源同等重要的国家资源。如何在区域研究中有效整合“语言资源观”“语言治理”等理论工具,构建多方言地区语言生活状况的研究框架,是一个有待探索的方向。

本研究正是以浙江省多方言地区为个案,深入考察不同社会群体在城乡、代际、场域间的语言选择、方言传承等问题,合理选取调查对象,并设计相应的问卷内容,最终为多方言地区语言生活的研究提供实证支持。

为了解当地多方言乡镇居民的语言生活状况,样本选取采用分层目的抽样方法。在每个调查乡镇,依据性别(男、女)、年龄(设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四类)、职业类别(务农、务工、经商、公职人员、学生等)等因素进行配额控制。调查问卷设计综合参考了社会语言学语言生活研究的通用框架,并充分考虑了当地多方言区域的语言生态特征,问卷共分为四个主要部分:1) 受访者基本情况(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职业、出生地、成年前后居住地等);2) 语言使用情况(语言习得顺序、家庭语言使用、不同公共场合的语言选择、思维能力及语言能力等);3) 语言态度(对本地话和普通话在好听、亲切、有社会影响、有用四个维度的1~5分量表评价,以及对他人使用方言的心理感受、对当地语言现象的评价与认知等);4) 公共文化与方言传承(方言节目的观看频率、方言节目的评价、本地民间文化的知晓度等)。

受访者均为当地长期居住的居民,以河南话为母方言者为重点调查对象,同时兼顾母语为平阳话、长兴话等其他方言的居民,以保障不同方言背景的数据覆盖度。问卷以入户访谈调查和集中填答相结合的方式收集,由受访者填写或口头回答。所有回收问卷经有效性审核,对基本信息不全或回答存在明显逻辑矛盾的问卷予以剔除,最终保留有效问卷143份,以最初发放的150份为基数计算,有效回收率为95.3%。

### 3. 多方言地区的语言使用情况

此部分的分析聚焦于以河南话为母方言的居民。核心关注点是河南话母语者在多方言环境中的语言能力、语言心理及其母语传承状况,因此在这一部分分析中,数据来源限于符合以下条件的受访者:① 经调查确认其小学前最先学会的语言为河南话;② 其主要抚养人最常使用的语言为河南话;③ 调查表中明确确认本人以河南话为母语。在这三个前置条件下,有效样本量为62人。

#### 3.1. 语言能力

以河南话为母方言的受试者共有62人,其中有60人能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约97%;有13人能用长兴话进行交流,约21%;有4人能用平阳话进行交流,约6%;有3人能用贵州话进行交流,约5%;有1人能用新安江话进行交流,约2%;有1人能用安庆话进行交流,约2%。同时,在以河南话为母方言的受试者中,9位受试者具有双方言能力,约15%;5位受试者具有多方言能力,约8%。详见图1和图2。

97%能够使用普通话的居民中,绝大部分为60周岁以内的居民,70周岁以上的老年居民无法使用普通话交流,以方言交流为主,这是受到学校教育、普通话普及与推广的影响。由此可见,中青年居民的普通话水平与受教育程度提高。

#### 3.2. 心理语言

关于心理语言的调查,我们向受试者提出“您在心里思考问题时最常使用什么语言”的问题。

## 方言使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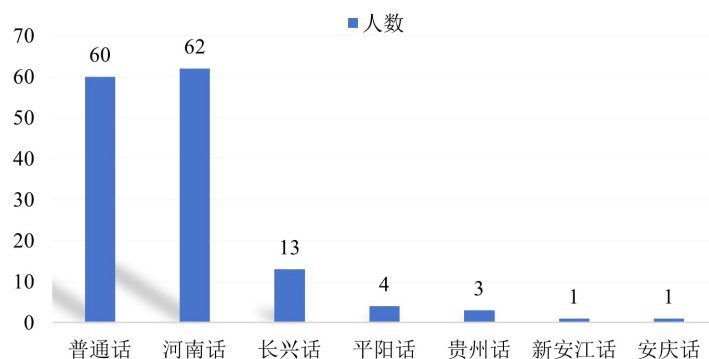


Figure 1. Dialect usage

图 1. 方言使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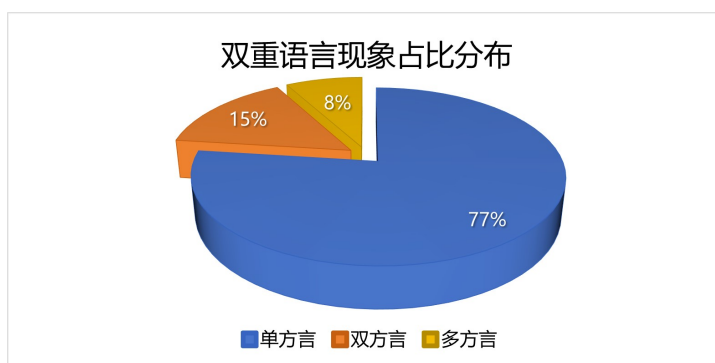


Figure 2. Proportional distribution of bidialectalism

图 2. 双重方言现象占比分布

调查结果显示,心理语言为河南话的人数最多,共 36 人,占比 58%;心理语言仅为普通话的人数为其次,共 14 人,占比 22%;心理语言为普通话和河南话的人数为 8 人,占比 13%;心理语言为仅长兴话的人数为 1 人,占比 2%;心理语言为普通话和平阳话和长兴话的人为 1 人,占比 2%;其余情况占比 3%。详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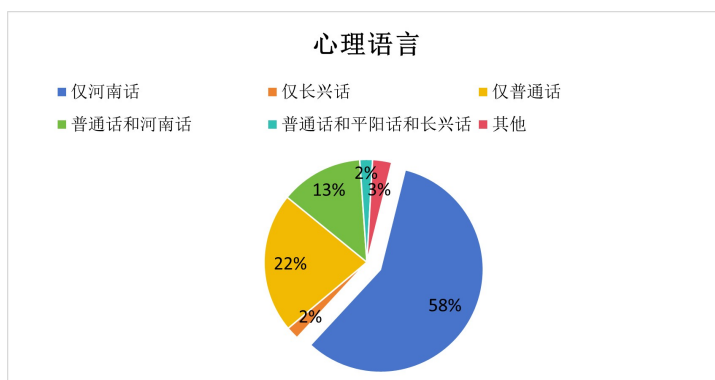


Figure 3. Proportional distribution of inner language

图 3. 心理语言占比分布

58%心理语言为河南话的受试者年龄分布在 25 周岁至 60 周岁不等,以中老年为主,其家庭语言多为河南话,且河南话大多为当地的强势方言,在日常交际用语中,他们使用河南话最为频繁,语言环境较单纯,因此语言倾向为河南话。22%心理语言为仅普通话的受试者以中青年和青少年为主,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并且大多数中青年在成年以后有 3 年以上外地居住经历,普通话成为其在社会不同方言交流中的共同交际语,因而语言倾向为普通话。13%心理语言为普通话和河南话的受试者以中年为主,他们受过中等及以上程度的教育,且绝大多数具有双层语言能力。

### 3.3. 方言代际传承

以 62 位河南话为母方言的受试者为参考,其小时候的抚养人为第一代,自己为第二代,子女为第三代,调查多方言地区居民的方言能力和方言的代际传承。

调查结果显示,56 位受试者小时候父亲(男性抚养人)最常使用的语言为河南话;其余的受试者其小时候父亲(男性抚养人)最常使用的语言是长兴话和河南话的为 1 人;是普通话和河南话的为 1 人;是长兴话的为 1 人;是河南话和建德话的为 1 人;是安庆话的为 1 人;是普通话和平阳话的为 1 人。

此外,56 位受试者小时候母亲(女性抚养人)最常使用的语言为河南话;其余受试者其小时候母亲(女性抚养人)最常使用的语言是长兴话和河南话的为 1 人;是新安江话的为 1 人;是普通话和河南话的为 1 人;是普通话和平阳话的为 1 人;是安庆话的为 1 人;是长兴话的为 1 人。

同时,30 位受试者现在与子女交流最常使用的语言是普通话;23 位受试者仍使用河南话交流;7 位受试者使用普通话和河南话与其子女交流;1 位使用普通话和长兴话交流;1 位为其他情况。

通过三代人的方言能力比较分析可知,第一代人在家庭语言生活中无人仅使用普通话交流,而到了第三代人则有将近一半的人数使用普通话交流,可见代际传承中普通话的使用频率呈上升趋势。同时,河南话的代际传承能力从第一代至第三代呈下降趋势,94%第一代人会使用河南话进行交流,而到了第三代人能够使用河南话进行交流的仅占 48%。这也是由于普通话普及与推广等政策的影响,在社会交际中普通话成为主要交际工具,从而作为优势语言在日常语言环境中占据主导地位,河南话及其它方言的习得比重下降。但在几种不同的方言中,河南话依然为强势方言,使用人数远远大于平阳话、长兴话等其他方言。

### 3.4. 语言的使用域

语言的使用域方面,我们设置了“在本地集贸市场买东西时最常使用的语言”“在本地医院看病时最常使用的语言”“在本地政府部门办事时最常使用的语言”“在单位谈工作时最常使用的语言”等问题,以不定向选择的方式引导受试者回答,受访者可以选择一至多个选项。详见表 1。

Table 1. Domains of language use

表 1. 语言的使用域

问题	语言					
	普通话	河南话	长兴话	平阳话	见到什么人说什么话	其他情况
在本地集贸市场买东西时最常使用的语言	30	39	7	2	1	1
在本地医院看病时最常使用的语言	45	21	5	0	0	1
在本地政府部门办事时最常使用的语言	48	20	3	0	0	2
在单位谈工作时最常使用的语言	36	38	2	1	0	2

续表

与同村人聊天时使用的语言	6	57	3	3	1	1
出远门时与不同语言的人聊天使用的语言	59	4	1	0	0	0
与陌生人第一次见面使用的语言	58	3	0	0	0	1
如果接受电台采访,使用的语言	57	16	0	0	0	0
村干部召开村民大会使用的语言	39	41	3	2	0	2

由表 1 可知,以河南话为母语方言的居民在不同社会领域的语言使用情况体现了语言社会功能的层级性。普通话作为顶层语言,其使用的社会域较广,承担功能多,尤其在医院、政府、电台采访等正式场合以及与陌生人、不同语言的人聊天时使用普通话频率最高。但在“与同村人聊天时使用的语言”这一使用域中,普通话的使用频率远远低于河南话,反映出以河南话为母方言的居民对河南话呈现语言忠诚。其次,河南话居民在日常交际场合中,使用母语方言河南话的人较多,使用本地吴语长兴话或平阳话等其他方言的人较少;在医院、政府或电台采访等场合中,使用河南话的人数占比约为三分之一;在村干部召开村民大会时使用的语言以河南话和普通话为主;总体来看,平阳话和长兴话使用人数极少。

这种语言使用情况是受到全面推广普通话的影响,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能够满足最基本的交际沟通需要,因此顶层语言的使用场合日益增加;同时,河南话是当地最主要的强势方言之一,人们为了交际的方便和维系河南母语方言的身份认同,河南话的使用场合也较广;以河南话为母方言的居民中,平阳话和长兴话在使用人口等各方面不如河南话,且习得难度高于河南话,因此流通性小于河南话。

## 4. 多方言地区的语言态度

### 4.1. 年龄与观看方言电视节目行为的关系分析

此部分旨在探讨年龄因素对方言节目观看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检验年龄组(青年、中年、老年)与是否观看方言电视节目两个分类变量之间的独立性。其研究指向是所有有年龄信息和观看行为信息的受访者。在 143 份有效样本中,剔除 2 例信息不明的样本,最终纳入卡方检验的有效样本为 141 例。

在数据整合与统计方法上,我们选取年龄组和观看方言电视节目两个变量,分别命名为 age group 和 dialect-tv。首先,将原始连续年龄变量重新编码为有序分类变量。分组标准为:35 岁以下为青年组(编码为 1),36~54 岁为中年组(编码为 2),55 岁以上为老年组(编码为 3)。其次,根据问卷中“您看不看电视里的方言节目”一题的回答,将“看”编码为 1,“不看”编码为 2。采用皮尔逊卡方检验考察其关联性。检验前检查期望频数条件:若期望频数小于 5 的单元格比例超过 20%,则考虑合并类别或采用似然比卡方结果,显著性水平设定为  $\alpha \leq 0.05$ 。

在 141 名有效受访者中,青年组( $\leq 35$ 岁)共 46 人,其中观看方言节目的仅 5 人(占 10.9%),不看 41 人(占 89.1%);中年组(36~54 岁)60 人,观看 35 人(58.3%),不看 25 人(41.7%);老年组( $\geq 55$ 岁)35 人,观看 32 人(91.4%),不看 3 人(8.6%)。总体观看比例为 51.1% (72/141),不观看比例为 48.9% (69/141)。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见表 2),所有单元格的期望频数均大于 5 (最小期望计数为 17.13),满足卡方检验适用条件。皮尔逊卡方值为 53.830<sup>a</sup>,自由度为 2,渐近显著性(双侧)  $p = 0.000$ ,  $< 0.05$ ,表明年龄组与观看方言节目行为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关联。似然比卡方(61.797,  $p = 0.000$ ,  $< 0.001$ )与线性关联检验(52.747,  $p = 0.000$ ,  $< 0.001$ )均支持这一结论,且线性关联检验显著提示观看比例随年龄组递增而呈现显著的线性上升趋势。

**Table 2.** Chi-Square test table (1)  
**表 2.** 卡方检验表(1)

	值	自由度	渐进显著性(双侧)
皮尔逊卡方	53.830 <sup>a</sup>	2	0.000
似然比	61.797	2	0.000
线性关联	52.747	1	0.000
有效个案数	141		

<sup>a</sup>.0 个单元格(0.0%)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17.13。

因此,我们认为年龄与观看方言电视节目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年龄越大,观看方言节目的比例越高。这一结果符合预期假设并支持既有研究的相关结论。例如,曹志耘(2001) [3]在讨论汉语方言濒危问题时指出,年轻人对方言的使用频率和认同感普遍低于老年人,而老年人则更倾向于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方言并对方言文化抱有更深的情感。

产生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包括:其一,老年人成长于方言占主导的语言环境,对地方戏曲、新闻等方言节目的内容有更强的文化认同和情感依恋[4];其二,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和推广,青年群体因学校教育、工作流动等接触普通话的机会更多,使用方言的机会相对较少,对方言节目的兴趣相对较低;其三,电视媒体中方言节目的受众定位本身可能偏向中老年群体,如地方民俗等节目内容本身也更契合中老年人的兴趣。

因此,在进行地方媒体的节目编排和语言规划时,若需通过方言节目传播地方文化或服务特定受众,应充分考虑不同年龄群体的观看偏好;同时,针对青年群体方言意识淡化的现象,可考虑开发更符合青年审美的方言文化产品,以促进方言的活态传承。

#### 4.2. 外地居住经历与对年轻人不说本地话态度的关系分析

此部分旨在研究外地居住经历是否会影响人们对“年轻人不说本地话”这一现象的态度。具体而言,我们将检验外地居住经历(是/否)与对年轻人不说本地话的态度(不好/好/无所谓)两个分类变量之间的独立性。

在数据整合与统计方法上,我们选取“外地居住经历”和“对年轻人不说本地话的态度”两个变量,分别命名为 *migrate* 和 *attitude*。首先,根据问卷中“15 周岁后是否在外地居住三年以上”一题,将回答“是”编码为 1,“否”编码为 2。其次,根据问卷中“有些年轻人不说本地话了,您觉得好吗?”一题,将回答“不好”编码为 1,“好”编码为 2,“无所谓”编码为 3。采用皮尔逊卡方检验考察其关联性,显著性水平设定为  $\alpha = 0.05$ 。

交叉表显示,在 143 名有效受访者中,有外地居住经历者 48 人(33.6%),无外地居住经历者 95 人(66.4%)。对年轻人不说本地话的态度分布为:认为“不好”者 77 人(53.8%),认为“好”者 47 人(32.9%),认为“无所谓”者 19 人(13.3%)。

在有外地居住经历者中,认为“不好”的比例为 41.7% (20/48),认为“好”的比例为 43.8% (21/48),认为“无所谓”的比例为 14.6% (7/48);在无外地居住经历者中,相应比例分别为 60.0% (57/95)、27.4% (26/95)和 12.6% (12/95)。可见,无外地居住经历者更倾向于认为“不好”,而有外地居住经历者对“好”和“不好”的态度较为接近。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见表 3),所有单元格的期望频数均大于 5 (最小期望计数为 6.38),满足卡方检验适用条件。皮尔逊卡方值为 4.686<sup>a</sup>,自由度为 2,渐进显著性(双侧) $p = 0.096$ ,大于 0.05,表明在 0.05 显

著性水平上, 外地居住经历与对年轻人不说本地话的态度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似然比卡方(4.662,  $p = 0.097$ )与线性关联检验(2.571,  $p = 0.109$ )均支持这一结论。

**Table 3.** Chi-Square test table (2)

**表 3.** 卡方检验表(2)

	值	自由度	渐进显著性(双侧)
皮尔逊卡方	4.686a	2	0.096
似然比	4.661	2	0.097
线性关联	2.571	1	0.109
有效个案数	143		

<sup>a</sup>.0 个单元格(0.0%)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6.38。

因此, 我们认为外地居住经历与对年轻人不说本地话的态度之间无显著关联。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语言态度本身受多种社会因素综合影响, 单一变量的独立效应可能难以显现。陈梦怡(2017) [5]提到不同城市居民对方言的情感态度, 与城市的发达程度或人口流动的属性并不高度相关, 有很强的个体差异。李宇明(2005) [6]也在论述语言学习与教育时指出, 语言态度是个体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 受到家庭、学校、社区、媒体等多重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外地居住经历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 其单独作用可能被其他因素(如年龄、教育程度、语言能力等)所中和或掩盖。

### 4.3. 受教育程度与普通话程度的关系分析

此部分旨在研究受教育程度与自评普通话程度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关联。具体而言, 我们检验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与普通话程度(较差、一般、较好)两个有序分类变量之间的独立性, 并考察二者是否呈现线性趋势。

在数据整合与统计方法上, 我们选取“受教育程度”和“普通话程度”两个变量, 分别命名为 `edu-level` 和 `pth-level`。首先, 根据问卷中的原始编码, 将受教育程度分为四类: 1 = 大专及以上, 2 = 高中/中专, 3 = 初中, 4 = 小学及以下。其次, 原始问卷中普通话程度为 1~4 自评。为满足统计分析的期望频数条件, 将原始评分合并为三类: 第 1 等级保持为“较好”(编码 1), 第 2 等级保持为“一般”(编码 2), 3~4 等级合并为“较差”。采用皮尔逊卡方检验考察其关联性, 并特别关注线性关联检验(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以判断是否存在线性趋势。显著性水平设定为  $\alpha = 0.05$ 。

交叉表显示, 在 143 名有效受访者中, 受教育程度分布为: 大专及以上 38 人(26.6%), 高中/中专 42 人(29.4%), 初中 46 人(32.2%), 小学及以下 17 人(11.9%)。普通话程度分布为: 较好 55 人(38.5%), 一般 66 人(46.2%), 较差 22 人(15.4%)。

不同受教育程度组的普通话程度分布呈现明显差异: 大专及以上组: 普通话程度为较好的比例最高, 占 63.2% (24/38), 一般为 36.8% (14/38), 不存在较差水平等级。高中/中专组: 较好占 52.4% (22/42), 一般占 47.6% (20/42), 不存在较差水平等级。

初中组: 较好占 15.2% (7/46), 一般占 54.3% (25/46), 较差占 30.4% (14/46)。

小学及以下组: 较好占 11.8% (2/17), 一般占 41.2% (7/17), 较差占 47.1% (8/17)。

从分布趋势看, 随着受教育程度从小学及以下到大专及以上提升, 普通话程度为较好的比例逐渐上升, 而较差的比例逐渐下降至 0。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见表 4), 所有单元格中仅 1 个单元格(8.3%)的期望频数小于 5 (最小期望计数为

2.62), 未超过 20% 的阈值, 卡方检验结果可靠。皮尔逊卡方值为 49.414<sup>a</sup>, 自由度为 6, 渐近显著性(双侧)  $p=0.000$ ,  $<0.05$ , 表明受教育程度与普通话程度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关联。似然比卡方(58.183,  $p=0.000$ ,  $<0.05$ )支持这一结论。线性关联检验值为 40.685, 自由度为 1,  $p<0.001$ , 达到显著水平, 表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普通话程度呈现显著的线性递增趋势, 即受教育程度越高, 普通话程度越好。这一结果与描述统计中观察到的趋势完全一致。

**Table 4.** Chi-Square test table (3)

**表 4.** 卡方检验表(3)

	值	自由度	渐近显著性(双侧)
皮尔逊卡方	49.414a	6	0.000
似然比	58.183	6	0.000
线性关联	40.685	1	0.000
有效个案数	143		

<sup>a</sup>.1 个单元格(8.3%)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2.62。

因此, 我们认为受教育程度与自评普通话程度呈显著正相关, 且存在线性趋势: 受教育程度越高, 普通话程度达到较好水平的比例越高, 较差水平的比例越低。这一结果与既有研究结论高度一致。程燕、肖奚强(2019) [7]在广东瑶族聚居区的实地调查也发现, 学历越高的人, 听说普通话的能力越强。周义凯、刘海涛(2024) [8]的调查也表明, 城市居民普遍认同普通话的工具性价值, 这一认同感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增强。郭熙(2013) [9]进一步指出, 教育通过教材、教师语言、校园交际等渠道强化普通话的使用, 从而塑造个体的语言能力和语言态度。本研究也发现, 在低学历人群向高学历人群的转变中, 普通话水平有一个跳跃点, 即初中及以下无人达到“较好”水平, 高中及以上则出现较好者且比例持续上升。在总体趋势上也进一步验证了教育与普通话能力形成了正循环——高学历与高语言能力相互强化。

值得注意的是, 本问卷采用的普通话程度为自评指标, 可能受到个体主观认知偏差的影响。受教育程度高者可能对语言标准有更清晰的认识, 因而在自评时更为客观; 而受教育程度低者可能因缺乏参照而低估或高估自身水平。未来研究可结合客观语言测试以获得更精确的测量。

## 5. 结语

综上所述, 潮州市多方言地区的语言生活呈现出动态平衡与功能分化的特征。河南话作为移民方言, 在当地扎根并保持较强活力, 但在普通话的强势影响下面临代际传承的挑战。

首先, 在语言能力方面, 以河南话为母方言的居民普遍保持较高的母语熟练度, 同时普通话的普及率也达到 97%, 体现出国家语言政策的显著成效。然而, 当地其他方言的掌握比例较低, 反映出在多方言接触的背景下, 不同方言的社会功能与使用人口呈现明显分层。河南话作为区域强势方言之一, 在居民的日常交际中仍占据重要地位, 但其代际传承能力从第一代至第三代呈下降趋势, 普通话的使用频率则逐代上升, 显示出语言生态正在经历深刻变迁。

其次, 在心理语言层面, 河南话仍是多数居民内心思维的主导语言, 尤其是中老年群体。普通话作为心理语言的比例随年龄降低而上升, 反映出年轻一代在语言认同上的转变。语言使用域的分析进一步揭示, 普通话在正式场合中占据主导地位, 而河南话则在非正式场合中保持优势。这种功能分化体现了多方言社会中语言的层级性与互补性。

再次, 通过统计检验可以发现受教育程度与自评普通话程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线性趋势, 表明学

校教育在普通话推广中发挥关键作用。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调查范围，纳入更多方言群体，并结合客观语言测试与质性访谈，深入探讨多方言背景下的语言演变机制。

最后，对于方言地区的语言生活研究而言，语言资源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方言不再仅仅是“即将消失的土话”或者“地方文化的载体”，更是一种可以被记录、保存、开发，并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资源。对多方言地区的语言生活展开研究可以为语言规划与方言保护提供更丰富的经验。

## 参考文献

- [1] 张利红, 刘小艺. 基于 CiteSpace 的我国语言生活研究可视化分析(1998-2022) [J]. 外语学刊, 2023(5): 44-51.
- [2] 苏新春. 语言资源观: 语言生活派的一个重要基础理论[J]. 语言战略研究, 2025, 10(5): 5-14.
- [3] 曹志耘. 关于濒危汉语方言的问题[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1(1): 1-7.
- [4] 祝畹瑾. 社会语言学概论[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3: 178-180.
- [5] 陈梦怡. 国内近 10 年城市居民语言态度述评——以上海、广州、南京、南宁、西安等 11 座城市为例[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7(8): 119-122.
- [6] 李宇明. 语言学习与教育[M].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5.
- [7] 程燕, 肖奚强. 广东世居瑶族居民普通话使用影响因素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 2019(3): 20-29.
- [8] 周义凯, 刘海涛.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兼述虚拟言语社区的地位和功能[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54(8): 124-137.
- [9] 郭熙. 中国社会语言学[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